

香港傳真

(香港)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10-21

2010年5月10日

讀《史說長征》，嘆英雄赤血為何？

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 張幸仔¹

2009年11月，大風出版社推出《史說長征》一書，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週年。若在燈紅酒綠、紙醉金迷中回望長征這段歷史，不僅已經物是人非，而且是“萬花飛度使人迷”，看不清，讀不懂。作者試圖完整敘述三個方面軍，在長征中克服困難衝破敵人圍追堵截，面對黨內和黨外一次又一次危機，用血肉之軀在殘酷的戰爭面前摸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歷史；對長征中的重要歷史人物和事件，對三個方面軍之間的配合、矛盾與犧牲都有更加完整的還原。閱讀此書有助於擺脫長期以來符號化的樣板，看到中國革命不那麼浪漫的另一面；看到黨和軍隊在挫折中，一步步成長壯大的經歷。

¹ 筆者為夏宇立《史說長征》的責任編輯，多年軍旅生涯，從普通戰士到解放軍藝術學院、到部隊院校工作，矢志不渝中國軍事和戰史研究。

而看清這部歷史必須有一個制高點，即國際大環境的變化，它發生在國際反法西斯的二次大戰與國內抗日戰爭的前夜。

一、《史說長征》的價值

《史說長征》著重描寫，在全國的革命根據地都遭到近乎毀滅性的打擊、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，紅四方面軍在川陝根據地，取得了反六路圍攻的偉大勝利，保存了一支頗具規模和戰鬥力的部隊以及一塊完整的革命根據地。這對當時全國革命力量的續存無疑是關鍵的，使得各地紅軍的戰略轉移，特別是中央紅軍的北上，有了戰略上的依託和保障。四方面軍為了配合黨中央和一方面軍的轉移，在敵情和我情不明、通訊不暢的情況下，毅然放棄經營已久的川陝根據地，突破嘉陵江防，努力向中央靠攏，一路闖關奪隘在懋功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，使得已經疲憊不堪的中央紅軍，得到了長征以來最難得的休整和補充，為繼續北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這段歷史在中國的革命史中應該有自己獨特的地位！

該書作者、研究紅四方面軍的專家夏宇立先生，² 歷時十年，踏遍長征路途中的千山萬水，遍訪參加過長征的各方面軍老同志、老將軍和當地民衆，深入各地特別是紅四方面軍途徑的長征紀念館、檔案館，大量閱讀當年的電報和信件。對長征中懸而未決或者疑問重重的部分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見解，詳盡描述了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豐功偉績。單從研究紅四方面軍角度看，本書重新認識，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在長征中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² 夏宇立先生是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。

二、歷史研究需要大是大非

《史說長征》書名言簡意賅，意圖全景反映長征歷史，但看過書後，感覺內容與作者的主觀意願在很多地方南轅北轍。原因很簡單，作者明顯偏向紅四方面軍，刻意貶低中央紅軍、貶低毛澤東。硬生生把一支政治目的一致、敵人一致的革命隊伍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，拆成兩個好壞立判水火不容的組織。直觀上看成了三國演義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在書中把一方面軍的政治、軍事，特別是指揮作戰描寫得一無是處，從失敗走向失敗。描寫紅四方面軍，則充滿了讚美和歌頌。反差鮮明，不斷製造機會，比較兩個方面軍的戰鬥力，而總是偏向四方面軍。誠然，一些老同志的回憶，必然帶有對自己老部隊的溢美之詞，這不難理解。但如果把這當做分裂的標誌，那對這些革命軍人的誤會就太深了。

在書中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，夏宇立先生，作為紅四方面軍研究的權威，對紅四方面軍充滿著感情，這種感情如同戰士對自己連隊的忠誠。同時，也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局限性，畢竟長征不是一個方面軍獨自為之，更不是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件，解讀長征所蘊藏的信息，需要的是對歷史的放大。

歷史研究需要大是大非，中央紅軍是蔣介石國民黨圍剿的主要目標，中央紅軍所面對的敵人不僅數量多，而且更是蔣介石的老本嫡系，國民黨軍隊中少數能死打硬拼的，都用於對付中央紅軍。

“富國強兵”曾幾何時對於列強環伺屢戰屢敗的中國，不過是個奢侈的夢想。“救亡圖存”才是這塊盛極而衰的古老土地上，最迫切最具有號召力的共識。在一個帝國主義如日中天，群雄四起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繁鬧人間，誰能使這麼一個積貧積弱，散沙一盤，極度自大又極度自卑的民族，在被徹底瓜分豆剖前起

死回生？為了救亡圖存，中國人神農吃百草，吃得上吐下瀉，如今眼看都 G2 了，仍然只敢說是摸著石頭過河，步履維艱。

在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事業中，中國共產黨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，徹底把中華民族從亡國滅種的危機邊緣拉回到富國強兵的道路上。曾幾何時，中國共產黨自己也只剩下“最後五分鐘”。1934 年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，紅軍被迫在生死存亡之際戰略轉移，脫離了根據地的紅軍，如同怒海中一艘掙扎的小船，是什麼力量力挽狂瀾，在最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革命、挽救了黨？

在當時的中國，凡蔣介石以下各個軍閥、大帥、司令，哪個不是“宗主國”武裝，兵強馬壯，身經百戰。而蔣介石身外，各國列強軍事理論與科技突飛猛進，閃電戰、制空權初露端倪，機械化戰爭呼之欲出。法西斯主義的幽靈在歐亞大陸上空遊蕩，中華民族再次面臨最危險的時刻！冷兵器時代中國農民革命人多勢眾的優勢一去不復返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還未扎根，廣大幹部戰士對革命的理解遠不及解放戰爭時期。

當一份份電報，被從塵封的檔案櫃裡翻出，被反復閱讀，被反復註釋；當歷史的細節越發清晰的時候，浸淫在微觀世界裡的歷史研究能反映出宏觀的原貌嗎？歷史需要放大來看。

三、歷史研究的慣性

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，曾經被無限神化和符號化甚至簡單化，以至於這段歷史竟然在很長的時間裡，不能被隨意觸碰，甚至人為地造成了對當時參加過長征的部分老紅軍的傷害。多少年後，當環境允許人們獨立回顧與思考那段歷史的時候，躍躍欲試之後卻發現在歷史的鉅大慣性下，對歷史的反省變成了被反省歷史的

延續。《史說長征》一書正是在這鉅大慣性下，滑出了歷史研究的範圍。

原本對長征的詩意和戲劇化的描述，只是對革命本身的浪漫修飾。通過質疑這些修飾，是否能解釋現實的本質？當這些質疑分門別類、逐條細化如：第五次反圍剿，如果毛澤東在指揮崗位上，能否繼續前四次的勝利？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？毛澤東一生打過四次敗仗，其中兩次即土城戰鬥和茅臺戰鬥都是發生在四渡赤水的時候，為什麼還說“用兵真如神”？紅一和紅四方面軍，歷盡千辛萬苦在懋功會師，為什麼最後會分道揚鑣，引發長征以來最大的危機？在長征前後和途中，很多同志被自己人殺害，他們的死是因為環境所迫還是因為鬥爭需要？

反過來說，在當時險惡的內外環境中，中國工農紅軍突出重圍，只許打勝不許打敗？毛澤東真是神，撒豆成兵，殺蔣介石如探囊取物。用得著 28 年武裝鬥爭？但四渡赤水走弓背路虎口脫險不算“用兵真如神”？民族生死存亡之際，路線鬥爭你死我活難道還兼顧個人品德修養？

小布什 2007 年 12 日在華盛頓出席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揭幕儀式時，稱共產主義如恐怖主義，20 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死亡最慘重的世紀。共產主義在這個世紀裡奪走一億人性命，光是在中國就有數千萬受難者……按這個邏輯演繹下去，挖掘細節，好的印第安人自然就是死的印第安人！

如此種種事事生非，清算的是戰爭本身，還是革命本身？如果革命有錯，剝削就有理。帝國主義戰爭，殖民壓榨奉天承運。如果革命無罪，革命中的矛盾客觀存在，有歷史局限性。也不能神是怎麼造出來的再怎麼放倒。美軍千里迢迢跑到伊拉克，推倒薩達姆銅像，世界矚目，全忘了當年兩伊戰爭自己火熱“支前”

的忙乎勁。小布什父子血債纍纍全是薩達姆的錯？

當歷史的慣性如鐘擺一樣晃動，推著我們向相反方向發展的時候，褒貶易位是否意味著從一個極端正走向另一個極端。四方面軍艱苦卓絕、機智勇敢、機動靈活，鮮血不能白流。說到底，無非是宣傳得不如一方面軍那麼突出，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沒有被完全展現出來。反過來說，中國革命前仆後繼，功名利祿都是革命成功後的副產品，非要削足適履為了打抱不平反攻倒算，第一步就邁錯了。

研究歷史不是描畫誰好人誰壞蛋，好壞人的故事，而是研究歷史所揭示的內在規律。別一講歷史就拖泥帶水，理論聯繫實際，借古喻今，翻歷史舊賬。當年把長征神化和簡單化，只突出一方面軍，放大主要人物作用的樣板戲“唱法”是違背歷史規律，現在踩一個捧一個，還是沒逃出樣板戲“敵遠我近、敵暗我明、敵小我大、敵弱我強”的窠臼。

四、歷史需要辯證去看

這本書還涉及到了長征中，頗具爭議的關於張國燾電令陳昌浩武裝解決中央的所謂“密電”問題，作者極力證明“密電”本身的種種疑點，借此突出毛澤東疑心過重、如驚弓之鳥，對分裂中央的罪責各打五十大板。當時北上和南下背後的政治含義不言自明。毛澤東臨走前找徐向前談話，徐向前的決心是“我是四方面軍的人，我不能讓四方面軍因為中央領導意見不一致而肢解”。³ 四方面軍不能肢解，紅軍就能分裂？這樣的大是大非面

³ 秦福銓：《博古和毛澤東——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》，（香港）大風出版社2009年，第156頁。

前，政治成了軍事的延續？作者用有沒有電報的小是小非，顛覆張國燾另立中央大是大非。

張國燾另立中央，而真正的中央則連夜潛逃。1938年他乾脆叛黨，被蔣介石授予中將軍銜，在軍統受戴笠指揮。個人受了“委屈”就叛變，反過來說，他革命的目的是什麼呢？

設身處地，當時鬥爭空前殘酷。鄂豫皖蘇區創始人曾中生，是會師以後，周恩來都勸不住，被張國燾殺害的。紅25軍長征到達陝北，肅反逮捕劉志丹，中央晚到一步就沒命了。再看徐向前在中央紅軍北上後的回憶，許世友問打不打？⁴ 陳昌浩居然不吭氣，還是徐向前的名言：“哪有紅軍打紅軍的？”⁵ 處處證明，不走的危險真實存在。

歷史研究的終極目的不是“通古今，垂教訓，明道德，辨忠奸”。同樣的歷史史實也有另外一種文化立場：現在有不少人拿“西路軍問題”質疑毛澤東。至於西路軍問題，請認真地全面地看徐帥是怎麼說的，不要斷章取義——這個問題也不像有人闡述的那麼簡單。西路軍渡黃河本是執行通莊靜會戰役計劃，本來沒有戰略任務而僅有戰役任務。結果因張國燾而泡湯，最後改變任務為打通國際路線，變成戰略任務。而在其間又因西安事變需策應中央紅軍，任務幾經變更，加上西路軍主要負責人陳昌浩因怕受張國燾的牽連，機械地不打折扣地執行中央命令，使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輾轉往返，失去了斷然東返和西去的時機，以至被消滅。

“有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？如果返河東有困難否？能否解決衣服？”這是毛澤東多次反復的詢問。張國燾對失敗都書

⁴ 金一南：《苦難輝煌》，華藝出版社2008年，第411頁。

⁵ 夏宇立：《史說長征》，（香港）大風出版社2009年，第423頁。

面認賬，把西路軍的失敗完全推到毛澤東身上不公平，也不厚道。是西路軍堅稱有西進把握，中央最後予以同意的。後因河東情況變化，中央建議停止西進。再後來還因蘇聯不同意西路軍退入新疆和西安事變等情況變化，全局的戰略要求使西路軍幾度變更任務，以至喪失了西進和東返的時機。

文中大談毛澤東山頭主義，同時也提到江青在文革時面對著徐向前叫嚷：“哪個山頭也沒有你徐向前的大！”仔細一數，她這句一點不錯！徐向前、許世友、李先念、王樹聲、王建安、王宏坤、周純全、陳再道、洪學智、王新亭、肖克……要非說毛澤東刻意削弱紅四方面軍，對各“山頭”一碗水端不平，這些我黨、我軍的高級領導幹部是怎麼產生的？⁶

尤其不著邊際扯出 1990 年代楊尚昆一段政壇往事，幸災樂禍，語言都是小人的話。

五、結尾

若說革命不是浪漫的，各種現實的矛盾都會在裡面出現，甚至有些表現的更激烈，這是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嗎？人的行為不過是對周圍環境的反應而已。這些人類與生俱來的屬性，憑什麼因為搞的是“革命”就會自動消失？反過來說，當時代進步到溫

⁶ 書中專門列舉了紅四方面軍受迫害人員名單，借來反襯毛澤東挾私報復，山頭主義，小人心態。無奈名單中太多建國後黨和軍隊領導人。徐向前“十大元帥之一”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、許世友“開國上將”、李先念建國後的湖北省委書記，1983 年被選為國家主席、王樹聲“開國大將”、王建安“開國上將”、王宏坤“開國上將”、周純全“開國上將”、陳再道“開國上將”、洪學智，1955 年和 1988 年兩次被授予上將軍銜、王新亭“開國上將”、肖克還是“開國上將”（夏宇立：《史說長征》第 659~660 頁）。

飽無憂、人文關懷成為“終極價值”的時代，居高臨下，連父母都有代溝，跨歷史、階級和文化環境，非要分出個文明和野蠻，在既成事實中找出捷徑，這事不需要歷史學家來幹。

中國共產黨不是太平天國，太平天國的教訓告誡我們，在帝國主義橫行的時代，傳統中國農民革命，王朝交替的道路走不通。紅軍不是國民黨，單純的民族主義在帝國主義稱霸的時代，妄圖走帝國主義的老路，甚至是法西斯主義道路也走不通。紅軍是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軍隊，不但革地主老財的命，同時也革帝國主義及其附庸的命。只有徹底的、決不妥協的革命行動才能拯救中國，當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識在千年塵封的土地上萌芽時，一切剝削與壓迫瞬時轉為最強烈的階級仇與民族恨，敵人越是瘋狂反撲，這種力量就越強大。解放戰爭僅僅打了三年，連毛澤東本人也沒料到，中國共產黨不但得到了獲得土地農民的擁護，也獲得了那些希望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進步知識分子的擁護。而國民黨這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不堪一擊。這個時候我們再反過來看四渡赤水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，那個神就是不甘心被壓迫的中國人民。

現如今批判那段歷史的文字很多，就如同西方社會痛斥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。至於它們是為何誕生則被隱晦掉。秦始皇焚書坑儒被知識分子罵了上千年，但很少有人願意去深究其背後的因果。《史說長征》的作者走遍千山萬水，跟隨紅軍足跡，十年磨一劍方成此書，使紅四方面軍的光輝歷史重放光芒。正是因為作者是研究紅四方軍的專家，而非研究一方面軍的專家，大量尋訪四方面軍足跡，而非一方面軍足跡，使得本書存在美中不足，甚至在書中刻意拔高徐向前在長征中的歷史地位。但拋磚引玉，能使更多的人能關注和思考長征背後的，中國人在革命中遇到的

現實問題。

如何建立超越自我的、正確的史學文化立場，再現正確的長征核心價值觀？無論如何，各種不同觀點的活躍爭論都是一種可喜現象。不僅為了讓先輩的鮮血不再白流，更是為了未盡的革命事業更加輝煌！